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學術會議）

參加 2013 第四屆亞洲社會科學學術 研討會報告

服務機關：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學系

姓名職稱：余一鳴 副教授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時間：102 年 6 月 5 日至 102 年 6 月 10 日

報告日期：民國 102 年 6 月 15 日

摘要

本次出國係由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補助參與國外學術研討會，參與 2013 亞洲第四屆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以「不道德的決策模式分析」為題參與論文發表。會中除了與國外學術進行論文研討外，與會期間亦相關學者進行問題的探討，由於該研討會係屬於跨科際間的學術研討會，因此，會議期間除了與相同學術背景的學術進行問題探討，亦透過該研討會瞭解目前不同學科發展的趨勢，提供不同的研究視野，吸收不同的專業知識，有助於報告人未來研究之進行與精進。

目次

一、 目的 \4

二、 會議議題重點內容 \4

三、 過程 \5

四、 心得 \6

五、 建議事項 \7

六、 研究內容及全文\7

一、 目的

亞洲社會科學年會 (The asian Conference ofn the Social Sciences)，國際學術研討會重要的論壇之一。雖然名為亞洲社會科學年會，但其組織成員包含美、澳、區、洲等會員國，是近年來新興的國際組織，主張跨科際間的學術交流，因此，吸引各學科的學者參與，目前已漸漸為學術界關注。報告人此次以倫理為研究主題，探討不同的倫理的決策模式適配性；期望尋求不同學術領域的意見，做為內容修正與研究進精之參考，其次由於發表內容符合此一學會之主旨，因此報告人投稿此一會議，以展現研究成果，並期與世界各地與不同學術的學者有所交流。

二、 會議議題重點內容

大會主題包含跨科際中的各項重要議題，包含：人類學、管理學、國際關係、文化研究及倫理學等有關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門都包含其中。會議中邀請了多位各學門的重量級人主進行演講，內容包含Eric M. Uslaner：「人際信任」(Serergration and Mistrust)、Thomas W. Simon：「國家發展」(Future Governance and Disappearing Nations: Canaries in the Sustainability Mine?)、Joseph Wunderlich：「綠建築和環境設計」(Green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Using Rapid-Prototyping Social-networking Sandbox Tools, Followed by Professional Architectural Software)及John Regan：「語意與革新」(Innovation Through Syntactic Manipulation)。會議內容相當多元，提供與會學者同的研究思考，有助於各學門及科際之間之交流。

三、過程

研討會共進行四天，第一天開幕茶會及與會人員報到，大會提供與會人員現場交流。第二至四天開始正式的各場次的議程，每天有 4 個發表時段，分別為 0915-1015(含 Keynote speaker)；1045-1130；1415-1545；1600-1730，每個時段分別有 8 個場地同時舉行，每個場次每次發表 3-4 篇，四天的議程總共發表近二百多篇論文。報告人被大會安排於第 3 天上午 1045-1215。

報告內容主要是探究個人主觀認知與客觀外在環境對於道德決策的影響。Jones (1991)的決策模式一直以來被視為道德行為研究的典範，然而，有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道德事件的強度是一種主觀知覺，而非 Jones 原先所主張的客觀知覺。意即 Jones 認為當決策者面臨不同的決策情境(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ral issue)，會受到道德事件「結果嚴重性」(Magnitude of Consequences)、「社會共識」(Social Consensus)、「結果發生機率」(Probability of Effect)、「時間急迫性」(Temporal Immediacy)、「親近性」(Proximity)、「效果集中程度」(Concentration of Effect)等特性的影響，形成不同程度的道德強度，進而影響決策行為。但 Kelley 和 Elm(2003)認為這些道德事件本身所產生的特質，引發不同程度的道德強度，實際上是來自於個體主觀對道德特質的感受。Kelley 和 Elm 認為每個決策者對道德事件的決策情境感受不同，因此，當具有同樣道德特質的事件發生，卻因為決策者的主觀感受不同，而有所差異。所以，Kelley 和 Elm 認為道德事件的決策情境並不是一種客觀存在的道德特質，而是需要靠決策者主觀感受的道德特質，當決策者無法感受到道德事件特質時，道德強度變無法影響道德決策。依據這樣的觀察，Kelley 和 Elm 修正 Jones 的道德決策模式，然而，截止目前為止，並沒有對這兩個模式進行整體性的比較評估，以釐清個體

的道德決策模式。基此，本研究主要透過結構方式模式去驗證 Jones (1991)與 Kelley 和 Elm(2003)的道德決策模型，透過模式的比較發現 Jones 與 Kelley 的決策模式，並不是最佳模式，而是綜合兩個模式而成的第三個假設模式的契合度最好。研究發現道德強度並不是客觀實存的概念，須要透過個體主觀感知，這種知覺能力受到組織因素影響，同時組織因素一方面透過道德強度間接影響道德決策，同時也直接影響道德決策。

四、心得

此為報告人第一次出席國際會議。在此行中，報告人有幾點發現：（一）本次與會雖然沒如預期獲得太多的意見回饋，但誠如當初所預期，觀察到不同學科研究的最新發展，而這些發展與研究方式可適度的移置於公共決策相關的研究之中。例如，本次研討會中第三天(6月8日)有位環境工程學門的學者發表社經發展對垃圾量的預測研究，所使得的「剩餘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預測未來台灣各縣市垃圾量，做為興建焚化爐數量的決策參考。該分析方法最早使用於生物生存狀態分析，本次發表的學者首度將此分析方法運用於環境決策。該方法不僅可有效解決以往決策分析過於粗糙的缺失，有助於預測未來發展趨勢的精確度，提升公共決策分析的品質，類似跨際科間的分析技巧透過該研討會的參與，有助於科際間的交流，亦是報告人本次參與此研討會的目的之一。（二）相較於國內相關的大規模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主題相當多元，因此與會學者人數亦較多，提供相當多元的研究視野。（三）此一研討會為跨科際的社會科學研討會，匯集了當代不同學科的研究者與會，是非常值得參加的研討會。（四）口頭發表雖能增加能見度，但屬於單向式的交流，通常時間有限，也無法和聽眾有太多的

互動，而壁報論文相對來說，其形式較為自由，若能吸引作相同主題的學者前來，更能增加互動機會及收獲。就表面效度而言，口頭發表似乎較能彰顯學術表現，但實際上，壁報論文發表形式卻帶給發表人更多所需的回饋，同時由於與會學者的背景不同，在多元學術訓練背景下，可以提供與會者或發表人更多元的意見。

五、建議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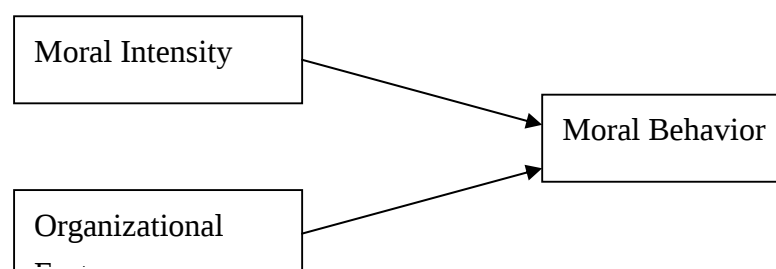
本次參與跨科際間的學術研討會，從中獲得不同的學科的觀點，有利於對於問題探討與研究的深入。建議相關單位可增加這方面的出國補助，以吸取更多的國際及跨科際的研究經驗及概念，提昇國內學術研究水準，發揮經費效益。

六、研究內容及全文

(一)道德決策模式

1. Jones 的精簡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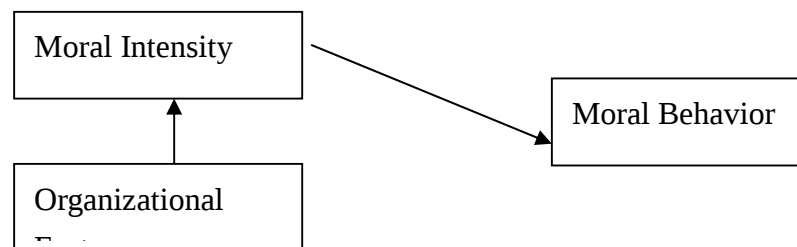
第一種是 Jones(1991)理論主張的模式，他認為道德強度與組織因素直接對個體的道德決策產生影響，而相互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關係。簡言之，在 Jones 的模式中，道德強度與組織因素分別扮演自變項的角色，相互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關聯（如圖一）。



圖一 Jones 理論精簡後之模式

2. Kelley 的精簡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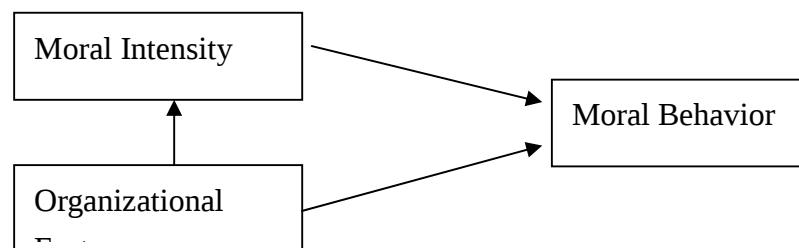
第二種是 Kelley 與 Elm(2003)的理論主張，他們根據以往的研究發現，認為道德強度並不是個客觀實存的概念，它必須透過個體對外在道德強度知覺，道德強度才會被賦予具體的意義(Killen & Smetana, 2006)，沒有這個知覺過程，道德事件強度無法影響個體，道德強度必須受到個體知覺，然後才可能對個體的道德意圖產生影響(Paolillo & Vitell, 2002)。因此，在 Kelley 的模式中道德強度被視為中介變項，組織因素並不會直接影響道德行為，而是透過個體的主觀知覺去感知外在的道德強度，所以道德強度是經由個體知覺加以建構，再透過這個知覺能力影響道德決策。也可以說，個體對客觀道德強度的知覺是來自於外在環境的影響。因此，Kelley 與 Elm 認為道德強度不會直接影響道德行為，而是透過組織因素引發知覺道德強度，再影響個體的道德決策。在 Kelley 的模式當中，組織因素是自變項，而道德強度是中介於組織因素與道德決策行為的中介變項。



圖二 Kelley 理論精簡後之模式

(三) 衍生模式

根據 Jones 與 Kelley 的不同觀點，道德決策可能存在兩種不同模式，組織因素即可能直接影響道德決策，又可能是透過道德強度間接影響道德決策，如果將 Jones 與 Kelley 重新交互組合可以形成第三種模式（如圖三）。據此，研究融合 Jones 與 Kelley 的模式再發展出第三個道德決策模式，做為假設模式。為比較這三種決策模式的契合度。研究是透過一系列競爭模式的假設檢定來進行，以比較因素結構的概念化。其次，由於 Kelley 的模式並沒有否定 Jones 的模式，所以亦無須以「驗證模式策略」(confirmatory modeling strategy)的方式進行，當然亦無須以資料衍生的方式來發展理論模式，因此將「模式發展策略」(model development strategy)排除於外。基此，我們採以競爭模式作為檢驗模式的研究策略。本研究依據上述理論探討的結果，設計三種模式，做為後續假設驗證之依據。



圖三 假設模式

三、研究結果：

表一列出本研究所提的假設模式與 Jones 與 Kelley 等兩個競爭模式之各契合度指標。根據表一，本研究所提的假設模式的 χ^2 與 df 的比為 3.20，且皆低於兩個競爭模式，顯示假設模式的契合度佳，為良好的模式。在適合度指標上，首先，假設模式之「契合度指標」(goodness-of-fit index, GFI; Bentler & Bonett, 1980)以及調整後之 GFI(adjusted GFI, AGFI)分別為.97 與.91，符合 Bentler 與 Bonett 設定的大於.90 的標準，而在兩個競爭模式當中，除了 Jones 模式的 AGFI 指數.85 低於標準值之外，Kelley 模式的兩個指數也都通過預設之標準值，這顯示假設模式與 Kelley 模式比 Jones 契合度佳，可以解釋觀察資料大多數的變異量。其次，假設模式與兩個競爭模式之 NFI(normed fit index)及 NNFI(non-normed fit index)均在理想的範圍內，大於.90，這顯示模式均有良好契合度。接著，在比較契合度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Bentler, 1980)，雖然三個模式者符合大於.90 的預設標準值，但仍以假設模式.98 最佳，高於其他兩個競爭模式。

表一

Competing models, Kelley model and Jones model(good-of-fit index)

	Jones models	Kelley models	Competing models
χ^2/df	5.21	3.44	3.20
GFI	.94	.90	.97
AGFI	.85	.91	.91
NFI	.96	.95	.98

NNFI	.95	.93	.97
CFI	.97	.92	.98
RMSEA	.13	.19	.09
AIC	103.63	71.81	69.22

表一亦列出替代性指標，殘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SEA; Steiger, 1990)。雖然假設模式並沒有達到 RMSEA 小於或等於.05 的要求，只有.09，但仍然是三個模式當中表現最佳的，根據 Steiger 設定的標準，雖然不是在理想的範圍當中，但仍落在不錯適配的範疇當中，相較於其他兩個競爭模式則落到標準值.10 以外。最後，在看 Akaike 的訊息指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Akaike, 1987)，以比較不同模式之優劣程度，在模式比較當中，AIC 指數愈低代表模式愈佳。在三個模式當中以假設模式的 69.22 最低，其次為 Kelley 模式，最後為 Jones 模式。顯示假設模式較其他兩個競爭模式更契合觀察資料。

綜上所述，假設模式各項指標均優於其他兩個競爭模式，其中除了 RMSEA 值不是很理想外，不過仍在可接受的範圍內。雖然 Jones 模式與 Kelley 模式也有不錯的適配表現，但總體看來假設模式是優於其他兩個競爭模式，而其中 Kelley 模式在適配度指數上又比 Jones 模式表現來的佳。